

文章编号:2095-0365(2019)02-0046-07

新时代青年对五四批判精神的继承与超越

崔家新

(淮海工学院 法律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连云港 222005)

摘要: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批判精神是五四精神的深层底蕴。五四批判精神揭示出中国传统文化保守、专制的一面,引发国民救国图强的思考,确立了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青年应继承五四批判精神,以诚挚的家国情怀勇担历史重任,以敢于质疑的态度练就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本领。同时,也要以反思的态度超越五四批判精神,认清五四批判精神中形而上学的一面,在批判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同时确立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式。

关键词: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精神;形而上学;辩证思维

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bskb.2019.02.08

五四运动迎来100周年,人们对这一运动的眼光几经变化。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回顾五四、重提运动的思想启蒙作用,到了90年代,思想文化的主流更多的是对五四运动的反思和检讨。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更多的是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予以“再反思”以期澄清事实、明确价值。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反思”和“再反思”之余我们更应该注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展现出来的批判精神的研究。不可否认,批判精神贯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始终,对时局的批判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迎来了科学和民主,推动了社会进步。对于五四批判精神,学界也多有关注,郭亚兴认为五四批判精神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核心是自我否定,虽然高扬爱国主义旗帜但也存在形式主义、缺乏社会基础、终极目标不明等诸多问题^[1];邓晓芒则认为五四精神的实质是一种文化自我批判精神,并以新批判主义指涉彻底的五四精神,以实现

对五四精神的继承与超越^[2]。这些研究虽然深入剖析了五四批判精神但都侧重于文化批判层面,对五四批判精神的教育意义观照不足。五四批判精神生成于青年的时代抗争,发展于青年的爱国情怀,蕴含着深厚的教育意义。当前很多青年人或是缺乏批判精神或是错误的理解批判精神,不能对批判精神形成一种正确的意识。因此,有必要全面梳理五四批判精神的具体体现、积极价值以及不足之处,挖掘其教育价值,以便在继承中反思批判精神,在反思中超越批判精神,从而为新时代青年健康成长提供历史依托。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批判精神

纵观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批判传统文化启蒙民众思想、批判北洋卖国政府引发“五四事件”到“问题与主义之争”,无不蕴含着批判精神。可以说,批判精神的存在揭示出中国传统文化保守、专制的一面,引发国民对救国图强的思考,确立了中国未来发展道路。

收稿日期:2018-11-11

基金项目:江苏省共青团2018年重点课题项目“高校团组织活力提升的泛娱乐化现象研究”(ZD2018020);2019年连云港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LK2031)

作者简介:崔家新(1983-),男,淮海工学院法律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本文信息:崔家新.新时代青年对五四批判精神的继承与超越[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3(2):46-52.

(一) 批判中国传统文化, 启蒙青年思想

提及五四新文化运动, 不可不提《新青年》杂志, 它的创刊掀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 “标志着—个根本性改革运动的开始”^[3]。在当时“国势陵夷”、“道衰学弊”的中国, 陈独秀之所以创办《新青年》, 用他自己的话说, 目的有二, 一是“阐发近世文明由来, 输入世界最新思潮”; 二是“改造青年之思想, 辅导青年之修养”^[4]。这两个目的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输入新思潮的目的在于改造青年旧思想, 而青年思想的改造又有赖于新思潮的引入。在这些目的之下, 《新青年》逐渐成为批判传统、启蒙民智的主战场。胡适、李大钊、鲁迅等新知识分子先后成为《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 他们以此为平台, 一方面展开对封建专制制度、传统伦理道德以及迷信思想的批判, 另一方面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 倡导民主、自由, 拥护科学技术。这两个方面同时进行、互为因果, 如陈独秀所说, “要拥护那德先生, 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洁、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 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5]。这也是一种对比, 一边是落后、反动, 一边是进步、科学, 很容易使思维活跃的“新青年”产生共鸣, 杂志的发行量从最初的1 000册猛增到1.6万册足以说明这本杂志受欢迎的程度^[3]。受《新青年》的影响, 1918年11月, 北京学生自发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 以批判作为杂志的精神, 致力于“价值的重新估价”, 进一步宣传新思想、批判旧传统, 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场“思想革命”进一步推向青年。同年12月, 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办的报纸《每周评论》则以政论性的文章进一步对封建思想进行批判。

这些杂志和报纸因其新锐、大胆、切中时弊的批判受到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欢迎, 客观上促成了青年组织的形成, 这其中包括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等。这些青年组织的成立进一步促进青年思想观念的觉醒和转变, 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注入了“组织”的力量。

(二) 批判北洋政府, 引发“五四事件”

思想上的批判使人们更加关注时局, 尤其启蒙了青年学生的思想、唤起了他们的爱国热情, 使他们更加关注中国的未来和命运。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五四事件”的基础。当时积贫积弱的中

国饱受列强欺凌, 而当政的北洋政府却妥协退让, 民众对于政府的行为忿恨不满, “五四事件”的发生就是在这种愤恨与不满中从对北洋政府的批判开始的, 随之而来的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激化了矛盾, 直接引发了事件的发生。随后, 商人、工人的后续参与进一步将学生的爱国事件转变为全国、全民族的救亡图存运动。可见, 这一切起于“批判”, 发展于“批判”, “批判”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细数“五四事件”前后发生的过程, 交织着对麻木的中国民众的批判和对政治时局的批判, 鲁迅笔下“吃着带血的馒头”, 自欺欺人的“阿Q精神”不仅仅是讽刺, 更是批判。而就时局而言, 日本在“二十一条”上持续的施压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意图借助于民众的反抗缓解日本的压力, 但这种建立在松散的军阀割据状态下的国力已然缺乏抵抗力, 民众的初步觉醒也不足以改变时局, 在利益面前, 即使面对全国范围内的一致声讨和批判, 北洋政府还是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但条约的签订也唤醒了民众, 所有有良知的爱国者都感到了痛苦的民族屈辱感。随后, 一战的胜利使中国人欢欣鼓舞, 以为长期遭受的民族屈辱能够得以洗刷。但北洋政府与日本之间的秘密借款以及“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使中国陷入了“法律尴尬”, 巴黎和会的失败已在意料之中。而这一切, 不仅受制于列强的贪婪本性, 更因为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 于是青年学生将对政治时局的批判转化为对北洋政府外交政策的控诉, 继而发展为对直接卖国贼的声讨。1919年5月4日, 北京高校学生组织游行示威活动, 以“外争主权”“内惩国贼”为口号声讨卖国贼, 将怒火从东交民巷烧到了赵家楼, 继而受到军警的打压、拘捕。为了营救被捕学生、宣传进步思想、批判政府的丑恶嘴脸、争取民众支持, 学生们走上街头散发请愿书、发表街头演讲、集体罢课、开展游行示威, 并通过团结和组织新知识分子以和平的方式与其他社会和经济势力实现联合, 在这个“狂飙的”运动时期向广大群众传播新思想, 推动了北京的“五四事件”向全国的“五四运动”的发展^[3]。而且在这一事件中, 青年学生实现了多个“第一次”的突破, 第一次游行, 第一次公开集会、演讲, 第一次贴标语,^[6]既丰富了“批判”的手段, 也彰显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 更使得广大民众看到了青春的力量、国家的希望。

(三) 批判与反批判,“问题与主义之争”引发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探索

1919年7月,胡适所著的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批判盲目地空谈“主义”的社会现象,倡导对中国实际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从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有论者认为,胡适的批判主要针对的是无政府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7],这一说法有些牵强。胡适所批判的是当时流行的各种主义,当然包括社会主义,这也是为什么李大钊予以反批判的原因。

客观地讲,“问题与主义之争”所引起的批判与反批判的论战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对于人们认清“主义”的本质,从盲目的狂热追捧中冷静下来考虑现实问题是有裨益的。对此,李大钊也是认同的,他所反批判的是胡适对“问题与主义”的绝对化割裂以及否认“主义”对解决“问题”的积极价值。胡适虽然抛出了盲目空谈“主义”的问题,但面对当时出现的各种“主义”,他本人也未作充分地了解,因为他本身也代表着“实验主义”,既然要放弃各种“主义”,是不是“实验主义”也应放弃呢?正像周策纵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对彼此的理论都未作过彻底的、批判的研究”,争论的各方都避免作深入的批判,而仅仅停留在引发问题的层面。

尽管如此,“问题与主义之争”却鲜明地诠释了批判精神。在当时,“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种批判的态度,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问题和输入学理。”^[8]所以,“问题与主义之争”是这种态度的现实表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种批判的表达是必要的更是必须的,它至少警醒人们避免进行纸上谈兵式的纯粹口号喊叫。同时,它也促使新知识分子对各种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尤其是促进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与中国实际问题的结合,因为“就在自由主义者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建议后不久的1920年,很多社会主义者及其追随者开始走向工人和农民中去研究他们的生活状况”^[3]。

二、在学习感悟中以历史使命感继承五四批判精神

(一) 继承家国情怀,勇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

无可否认,五四新文化运动蕴含的批判精神

有着浓浓的家国情怀。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鲁迅、周作人、李大钊、沈尹默、刘叔雅、吴虞、易白沙等人都生长于晚清末年,他们在青少年时代都受过典型和严格的传统式教育,其文化背景可谓以传统为底色^[9]。但就是这样一群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人却站起来反传统。这里有两个原因值得注意:一是清代朴学的影响。追求客观的朴实精神,反对空谈的主观冥想。二是这些新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有过留洋经历,外国的文化观念对他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出国留学也得益于当时的大环境。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也扩大了知识的传播,“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以及后来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进一步促进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西方列强也有意向中国输入文化,比如美国就利用庚子赔款作为中国留学的费用支持中国青年人出国留学。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对历经多次改革仍然积贫积弱的中国,新知识分子意识到要救亡图存,必须进行“思想革命”,必须毫不留情地批判传统,“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10]。而“五四事件”更是学生以国家、民族安危为己任自发的爱国表达。如果没有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没有巴黎和会的失败,没有北洋政府的无能与苟且,学生也想安心学习^[11],但国家危亡,青年学生唯有以自己的方式表达诉求,在批判中揭露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在批判中唤醒国人对国家危亡的重视。相较于新文化运动与“五四事件”,“问题与主义之争”产生的影响较小,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而且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这种蕴含着家国情怀的争议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它是对中国未来走什么样的路的思考,是在那个思想狂飙的年代给社会注入的“镇静剂”,启发人们去思考,启发人们选择适合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

对于新时代青年而言,应该继承五四批判精神所流淌的家国情怀。虽然现在的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使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与五四时期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中国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并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状,新时代仍肩负着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力量的历史使命。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离不开新时代青年的参与,更需要新时代青年“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12]所以,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情怀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中仍然大有可为。

继承五四批判精神的家国情怀,首先需要新时代青年对戊戌变法以来中国人民救国图强探索中依次选择的资本主义改良道路、官僚资本主义道路的批判中,认识中国人民最终选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唯有如此,才能在比较中找到答案,认清什么样的政治信仰才符合中国的发展道路,什么样的政治信仰才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它的实践依据,并在此基础上,以信仰的力量将个人成长成才融入到国家发展之中。其次,需要新时代青年以批判的态度审视当下流行的社会思潮,认清其本质和危害,自觉抵制不良社会思潮对自己思想的侵蚀,坚定理想信念,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精神”的自我成长中做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最后,需要新时代青年以批判的态度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十九大报告已经明确,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新时代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青年应以批判的眼光充分认识这种矛盾转化的历史和现实依据,自觉检视自己的行为,明确自己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在奉献青春力量中与这一社会新矛盾作斗争。

(二)继承敢于质疑的态度,增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

敢于质疑是一种态度。从明末开始,中国文人的“复古解放”思潮都是在“疑古”思想的推动下向前发展的。这其中,“疑古”包含着“信古”,“信古”掺杂着“疑古”,始终贯穿着一种证伪的批判精神^[9]。但遗憾的是,这种“批判”只“注重功力而忽略理解”从而导致“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13]的境地。也就是说,这种“批判”仅仅停留在“批判”本身而缺乏思考。因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被改造,反而是以“复古”为名,脱离社会的客观实际状况机械地进行思想上的追本

溯源。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知识分子着眼于旧中国积贫积弱的客观现实及袁世凯、张勋逆时代潮流的复辟闹剧,继承了“复古解放”中的批判精神,同时,将这种“批判”推向深入,就像胡适所说的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一态度,就是敢于质疑历史上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问一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对于古代口口相传的圣贤教训,问一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对于社会上被糊涂公认的行为和信仰,问一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哪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吗?”^[11]显然,这些疑问立足于“社会存在”是对“社会意识”的冷静思考,更是一种思想上的进步,它意识到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4]的道理,闪耀着唯物史观的光辉。

新时代青年能否担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仅依靠“情怀”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还在于自己能否成长为有益于社会的有用人才。在青年成长的过程中,以批判精神作为治学态度,敢于质疑,勇于质疑,更有益于青年自身的发展。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全国以各种形式纪念马克思,对于青年而言,最应该向马克思学习。马克思在高中时期即树立了以“人类幸福”为己任的奋斗志向,这种志向伴随其一生。在其奋斗的过程中,面对庞大的黑格尔哲学体系、面对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自己却越贫穷的客观现实,他勇于质疑,展开了对“旧世界观”的理论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自我批判^[15],在这些批判的过程中,他获得了两个最重要的发现,一个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另一个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即“剩余价值的发现”,从而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新时代青年适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盛世,肩负历史重任,更应该以马克思为榜样,以批判精神作为自己的治学态度,在质疑中批判,在批判中创新,在创新中成长成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社会上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理应走在创新创造前列。”^[16]这是总书记对青年创新力的认可,也是对青年引领国家创新发展的

期盼。而创新往往从质疑开始,与批判相连,青年人要创新必须打破思维定式,培养独立思考能力。“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而是激情的头脑。”^[17]作为青年人,面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无论是科学概念还是生活方式,无论是流行的思维方式还是流行的原则,都不应盲目接受,更不能不加以批判地仿效”^[18],而应积极地批判,在批判中寻找创新的火花。唯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挥青年的青春优势,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做出成绩、实现自我。

三、在批判反思中以辩证思维超越五四批判精神

(一)五四批判精神中形而上学的一面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批判精神虽然值得继承,但正如毛泽东所评价的那样,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知识分子“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19]。这就是说,五四批判精神中存在着形而上学的一面,这恰是我们需要超越的。

那么,何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呢?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它又是如何体现的呢?简单的说,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以“‘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思维方式去看待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把人对世界的统一、思维对存在的统一,都理解和解释为无矛盾的、非发展的、肯定性的统一”^[20]。这种思维方式看不到客观事物的运动变化过程,是一种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主要体现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及西方思想文化的态度上,也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的“全面反传统”及“绝对的好,一切皆好”的“全盘西化”。有学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不是全面反传统而是“‘英勇’反封建,并指出这是‘矫枉过正’的需要”^[21]。不可否认,那个时代对传统文化的确存在“矫枉过正”的心态,但“矫枉”与“过正”是两个紧密相连的状态,既然存在“过正”的现象,就必然有“过”的现实依据。李大钊在《晨报》中曾呼吁青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取由来之历史,一举而摧焚之,取从

前之文明,一举而沦葬之。变弱者之伦理为强者之人生,变庸人之哲学为天才之宗教,变‘人’之文明为‘我’之文明,变‘求’之幸福为‘取’之幸福”^[22]。这其实就是在鼓吹青年在思想上全盘反历史、反文明,就是在追求“过”的表现。而为什么追求“过”呢?胡适解释道,“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否认上帝,为的是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23],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民族情绪,整合民族情绪”^[9]。所以说,“全面反传统”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更像“一个战略性的口号”^[24]。作为一种口号,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它能起到“振聋发聩”的警醒作用,但作为一种批判的思维方式,则存在不足。这种不足主要体现在新知识分子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把握上。不可否认,鲁迅笔下“吃人的礼教”确实存在,“孔教”确实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石。从这一层面上看,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应该批判。但是中国的传统就一无是处吗?当然也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博大精深,滋养了中国人民优秀的品质,时至今日,仍发挥着定分止争、陶冶情操的作用,尤其是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理念,已经成为个人修养的基本遵循,对于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提升个人修为具有积极价值。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也高度认可,他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概括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并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25]。由此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全盘否定”的批判性“思维”没有完全反映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客观“存在”,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样也就无法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予以正确地批判。这种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思维方式恰是我们需要批判和超越的。

(二)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超越形而上学思维

辩证思维与形而上学思维是相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总是排斥对它的‘否定的理解’,它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总是排斥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26],因

此,这种思维方式从本性上而言是非批判性的。这种思维方式也为黑格尔所反对,他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之上以精神的存在为例指出“我们不能把精神看成一个没有过程的存在(ens),像旧形而上学的办法,把精神无过程的内在性和它的外在性截然分开。我们主要的必须从精神的具体现实性和能动性去考察精神。”^[27]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克服了唯心主义的羁绊,在“扬弃”中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一方面继承了辩证法“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质,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28],在批判中对批判对象进行积极地“扬弃”,丢弃事物中过时的、无用的因素,保留事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全部优秀成果^[29];另一方面建立在客观事物的感性活动的基础之上,立足于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运动揭示事物的发展过程,具有客观性、联系性、发展性、全面性和系统性的特点^[30]。

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式是新时代青年正确认识事物、客观把握矛盾的正确思维方式。新时代青年超越五四批判精神,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武装头脑,超越五四批判中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就要求我们现在反思五四批判精神同样也要避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而应立足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以辩证思维方式为指导,既要认识到“全盘否定”的实践必要性,也要充分认识到这一思维方式的不足之处,在继承五四批判精神的同时注意区分和扬弃。

(三)以辩证思维武装新时代青年头脑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更应避免陷入“形而上学”的思维陷阱,而应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武装头脑,在生活中认真领悟并积极实践。

首先,要学会一分为二的全面看问题。一分为二就是要全面地分析问题,尤其要避免将批判

等同于一味地质疑,尤其是有选择地质疑,这就会重蹈“形而上学”的覆辙,否定一切。而应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准确把握事物的发展进程,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事物的全貌。

其次,要善于从实际出发,从现实实践的角度分析问题。现在是网络社会,各种思潮隐匿其中,各种消息鱼龙混杂。尤其是微博、微信为代表“微文化”兴起以后,消息来源更加多元,消息传播更加随意,这就需要我们以批判的眼光,辩证地分析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实践”为依据,多问问为什么?不能偏听偏信,否则有可能落入别有用心的人的圈套,成为“替罪羊”、“牺牲品”。

再次,以“联系”、“发展”的视角看待周围的问题,科学把握事物间以及事物内部的联系。要认识到联系的必然性和发展的运动性,对于社会中出现的种种现象要有独立思考能力,真正做到亲眼去看、亲耳去听,认真的思考,分析其来龙去脉,认清其本质,有所为有所不为。比如嘻哈文化。这一文化形式为青年群体所追捧,是因为其特有的文化潜质——主张自由个性的张扬和无拘无束的生活态度,这无可厚非,但这种文化也先天地蕴含着西方嘻哈文化的“反叛”和“低俗”。这就要求新时代青年以辩证思维全面分析它,既不能毫无原则地“迎合”、“谄媚”也不能视其为“洪水猛兽”一概拒之。而应该全面地了解这种文化,以“发展”的眼光对这种文化予以积极的“扬弃”,改造它、发展它,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

总之,新时代的青年在纪念五四运动时应有自己鲜明的态度,辩证地看待五四“批判精神”,在思维上积极地扬弃,在行动上勇敢地超越。真正做到李大钊所说的“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参考文献:

- [1]郭亚全.“五四”批判精神辨析[J].理论与现代化,1997(5):11-14.
- [2]邓晓芒.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新批判主义宣言[J].科学.经济.社会,1999(4):12-22.
- [3]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42,76,123,226.

- [4]陈独秀.答王庸工《国体》[J].青年杂志,1915(1).
- [5]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J].新青年,1915(6).
- [6]陈占彪.五四事件回忆:稀见资料[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4.
- [7]李良玉.关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考辨[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93

- (1):98-106.
- [8]胡适. 新思潮的意义[J]. 新青年, 1919(7).
- [9]欧阳哲生. 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61, 69, 269.
- [10]陈独秀. 发刊词[J], 青年杂志, 1915(1).
- [11]胡适. 人生有何意义[M].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5:68, 73.
- [12]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70.
- [13]欧阳哲生. 胡适文集:第3卷[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8.
-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530.
- [15]郭正红. 马克思主义自我批判精神及其当代价值[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5(5):36-62.
-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46.
-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12.
- [18]霍克海默. 批判理论[M]. 李小兵, 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9:243.
- [19]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831-832.
- [20]孙正聿.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176.
- [21]陈卫平. 新文化运动反传统之辨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15(11):20-27.
- [22]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2卷[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369.
- [23]欧阳哲生. 胡适文集:第5卷[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579.
- [24]朱晓进. 重读五四[J]. 江苏社会科学, 1999(3):1-6.
- [25]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72, 164.
- [26]孙正聿. 哲学通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219.
- [27]黑格尔. 小逻辑[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104.
-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12.
- [29]李士坤. 论哲学的批判精神[J]. 理论探讨, 2014(4):41-45.
- [30]唐正东. 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的一般特点和基本规律——兼论习近平同志的辩证思想[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3):13-20.

Inheritance and Transcendence:

Critical Spirit of the May Fourth Period in the Youth Dimension

Cui Jiixin

(School of Law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ai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ianyungang 222005, China)

Abstract: In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criticism always presences, and critical spirit is the base of the May Fourth spirit. Criticism reveals conservative and autocratic sid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stimulates people's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to establish China's future developing path. Whe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ed a new era, the youth should undertak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bravely, and improve ability to build a strong socialist country. Meanwhile, the youth should also recognize the metaphysical side of the critical spirit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establish Marxist dialectical thinking mode to contribute to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critical spirit; metaphysics; dialectical thinking